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上架



GUANNIAN GENGXIN LUN

# 观念更新论

李君如著

当代人文学者书系

当代大学书林  
观念更新论  
李君如 著

---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字数: 155,000 开本: 850×1168<sub>1</sub>/<sub>32</sub> 印张: 8 插页: 5  
印数: 1—8,700

---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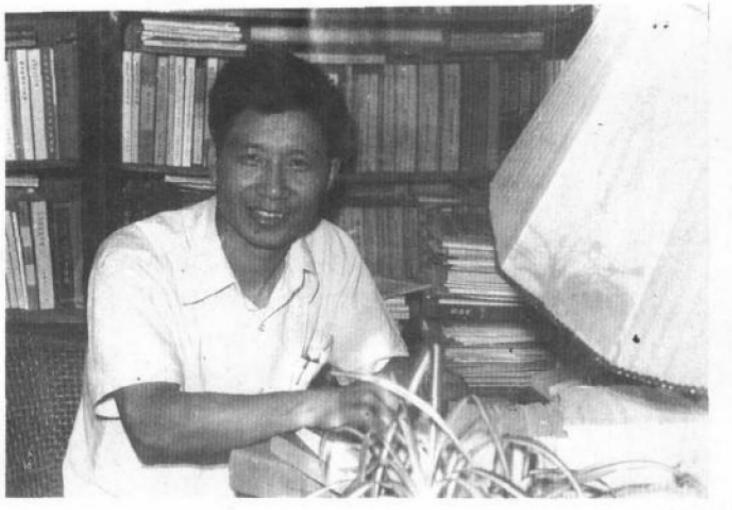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贾非贤 封面设计: 安今生 安迪  
特约编辑: 刘明德 责任校对: 孙明晶

---

ISBN 7-5382-0406-7/B·6

---

定价: 2.75 元



李君如，1947年生于上海。1972年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培训毕业后在教学工作岗位上坚持自学哲学，1980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成为专业哲学工作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任中国马哲史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上海马哲史研究会副会长。曾撰有《西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情况概述》、《论结合方法》、《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等论文，并合著有《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民主论》等著作。近年对“观念更新”的理论研究颇感兴趣，曾发表《略论“观念群”更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观念群”更新》等论文和演讲，提出了“观念群”更新这一新概念、新见解。

## 编 辑 序 语

近年来，出版界丛书热风吹遍大江南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套套丛书接踵而至，这种趋势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当代意识流。《当代大学书林》，也是在这块文化温床上破土而出，并将以自己的特色，跻身于丛书之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现代通讯设备已将信息的传播推向崭新的阶段。由此，地球变得驻小了。如果说在古代，闭关锁国还可生存，那么在今天，一个国家如果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那将成为神话了。

在我国的封建时代，曾有几个王朝对外开放，使中华民族的文明传向世界，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本世纪初，五四运动的先哲们，打破了近百年的沉寂，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先进的世界观和优越的社会制度，我们本可以发扬五四精神，保持同世界的联系，以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去赢得世界。非常遗憾，“左”的错误和各种历史因素使我们自己关上了门。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世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图景。在改革、开放的十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取

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样令人鼓舞的背景下，以传播新思想、积累科学文化成果为己任的我国出版界，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我们有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十年的卓有成就的实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体系的时候来到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材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都与其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面貌，常常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地方教育出版社，我们首先要为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服务。同时，我们愿意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正是出于这种职业责任心，我们确定了《当代大学书林》的出版计划。

《当代大学书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方针，有选择地介绍当代中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知识、新学科、新观点、新信息，力图在介绍世界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鉴别，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而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我们愿意为此而竭诚努力。

《当代大学书林》，要把那些卓有见地、敢于创新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纳入“书林”之中，并真诚地推荐给高等院校广大师生，以期在大学的“选修课”、“专题课”、“系列讲座”的教学中留下“书林”的踪迹，这将是我们极感欣慰的憧憬。

《当代大学书林》，是一套综合性丛书，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宗教哲学、科学哲学、艺术规律研究等广泛领域。以大专学生、研究生以及自学青年为主要对象，同时也面向广大社会读者。

《当代大学书林》，以学术研究著作为主体，也适当选入部分译著。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观点，我们的态度是：有益的，借鉴；有害的，批判。五光十色的世界，并不都是金子在闪光，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是我们要坚决剔出的。所谓“西方文化热”，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现象，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以科学态度，求实的精神，不懈的努力，重建东方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先。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必将同步前进。《当代大学书林》愿作教育大军中的一个小卒，贡献我们应尽的力量。

不树桃李树书林，辛勤耕耘也成荫。愿我们的作者、编辑和广大读者互相支持、通力合作。热切盼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出。

1988年元月20日

## 序 言

我是一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工作者。我历来认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注释和解说毛泽东哲学著作及其原理的水平上，也不能做纯哲学的研究，而应该进一步依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研究和解决实际的哲学问题。或者说，从哲学上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本书根据这样的想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研究了今天时代所提出的“观念更新”这一重大的课题。虽然本书涉及的许多问题，我并不认为已经完全搞清了，但我的愿望是：期待更多的同志来探索和研究这一问题，努力使我们可爱的祖国循着四项基本原则指出的航向，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充满活力，破浪疾进。

有人说，研究这一课题有很大的危险性。我想，这恐怕是一个事实。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稍不谨慎，就有可能妨害我们党的事业，也即我甘愿为她奉献一切的事业。但时代需要人们研究这一课题，党的事业需要人们解决观念更新的问题，社会责任心、党性驱使我思考和研究了这一课题。我想，关键还在于要有科学性。现在，“观念更新”似乎成了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在有些

## 2 观念更新论

---

地方、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所谓“观念更新”热。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热”就忘记了“冷”，即忘记了科学性，以致“热”过了头，即使是好事也会办成坏事。观念更新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工作，它不仅仅会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而且会触动观念背后的利益问题，需要人们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解决它。它既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的历史潮流，也不是靠名词翻新，或简单地搬用一些观念舶来品，就能解决问题的。它取决于社会存在及其变化的深刻程度，有自身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它又取决于人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即“观念更新”理论的成熟程度。我想，努力探索它的规律，并从规律上来把握和推进观念更新，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为此，全书研究了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讨了观念和观念更新的一般规律；接着考察了近现代中国观念冲突和更新的特殊规律；最后归结到对于当前观念更新问题的研究。这就是全书的基本构架。

需要说明的是，观念更新问题的研究，应该属于观念学研究的问题。它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多层次交叉的新学科。这里，比较多地结合文化哲学，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做了一些探讨。也就是说，本书研究较多的是同我国当前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政治实践相联系的观念问题。当然，无论是开拓政治哲学，还是建设观念学，都有待于人们持久的努力。《观念更新论》或许可以为这方面的学科建设，尽一点

绵薄之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朱永林、周山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的同志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鼓励，名誉所长周抗审阅了书中部分章节，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王之江对本书的组稿和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 者

1987年7月

## 引　　言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这是一个激荡人心的时代。在党中央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指引下，改革、开放汇成历史的潮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观念更新”成了时代的强音。

引人注目的是，这场观念更新是从古老的乡村开始的。

——“安徽凤阳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最近又出了一个人物，他叫陈庭元，不是凤阳县人，但是到了凤阳县当县委书记，他用联产承包，即‘大包干’责任制，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过来了。”人们在交口赞誉陈庭元的改革功勋时，特别称颂他同旧观念冲撞的决心和意志。因为正当陈庭元在凤阳总结和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时，1979年3月，某报突然以头条新闻加“编者按”，批评“生产责任制”是“单干”。但陈庭元说：“联产计酬”是好是坏，秋后再说。坚持用实践为标准来检验自己的做法和

社会上的议论，最后终于用连续多年大丰收的事实回答了人们在旧观念下提出的种种问题。〔见文献1〕

——经济学家林子力介绍过一件事：“早在1978年，贵州省就选择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为突破口，大抓多种经营，想由此将农业搞上去，扭转穷困面貌。哪料到，‘抓来抓去，收效甚微’。因为，生产关系的问题没有解决，群众积极性受压抑，调整贯彻不下去。这年年底，某公社搞起了定产到组（定产亦即联产、包产，‘定’、‘联’、‘包’在群众中是通用的，讲的是一回事），省报发表了一篇《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短评；几天之内家喻户晓，‘比任何一个文件都传播得迅速’。从此农村里到处搞起了联产承包。由于相当一部分干部出于原有的眼光和观念，以为联产承包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因而对群众的行动进行‘纠偏’，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中有的干脆就不想种地了。1979年秋收过后，60—70%的板田迟迟没有人犁。就这样上下顶牛当中，联产承包仍然在发展。到1980年春天，不仅包到组，并且有30%的社队包到了户。一些同志感到，再将包干打入‘另册’，显然不行了。”后来终于把它从“另册”转入“副册”，又升入“正册”。对于这段历程，贵州省一位负责同志意味深长地归纳了四个字——“节节败退”。〔见文献2〕那么，究竟是什么在“节节败退”呢？首先，很明显，是旧观念——认为联产承包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旧观念在“节节败退”，农民欢迎的是“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新观念。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就是在这种观念更新的过程中实现的。

自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由联产承包向专业化、商

品化深入发展，观念更新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人们关于“晋江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关注和争论，就是新旧观念冲突的表现。古老的中国，古老的乡村，在八十年代发生了如此广泛而又深刻的观念冲突和观念更新，多么令人注目！

不仅仅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民中出现了这样令人惊叹的新现象，就是在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力占支配地位的大中城市里，人们也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中进行着自己的选择，经受着观念更新的考验。比如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战略决策，传到上海这个工人阶级集中、具有长期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的大城市，群情振奋，倍受鼓舞，准备接受改革与开放的新考验，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上海面临的形势非常好，但是也确实有咄咄逼人的感受。”从市长到市民，都决心用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但也有人疑虑重重，担心“帝国主义剥削”和“租界”会重新回到上海滩。究其原因，就是把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旧中国“门户开放”的卖国政策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把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信念对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观念混乱现象。这种现象所掩盖的更深刻的原因，是新旧观念的冲突。因为在一些同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中，闭关自守，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任何先进的东西，才合乎社会主义的原则。这种陈旧的、僵化的观念，成了我们正确贯彻由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构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思想障碍。正是为了坚持

#### 4 观念更新论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观念更新”日益成了上海、广州……各大中城市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首先是由全面改革这一大背景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是由相互作用着的经济、政治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倒三角形结构。其中，经济处于这个倒三角形社会结构的顶点，又是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对经济有强大的反作用；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以其强大的反作用对经济和政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革新或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变革；而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每一更新或变革，又往往是经济和政治发生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革新或革命的先导。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内部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方法论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其中心问题即中国人民的观念更新问题（用毛泽东的原话来说，是“革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见文献3〕对我们今天的改革，邓小平同志认为，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一“革命”，发端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即社会结构的基础内部，具有明显的深刻性。它不可避免地会要求政治体制，并进而要求观念形态的文化发生与此相适应的变革，包括对人们的观念进行必要的更新。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也证明了如果没有观念的更新，就不可能广泛地、深入地、健康地推动改革的发展。我们常常见到这样

三种现象：一是观念混乱现象。在改革的一定阶段里，某些人对各种观念的正确与错误感到难以把握，大呼“吃不准”、“说不清”，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二是观念摩擦现象。有些人一方面从切身经验上体会到了改革及其建立的新体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为固有的旧观念所束缚，感到不习惯，甚至出现了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这种现象必然会影响改革的顺利发展。但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反对改革”，它是新旧观念之间的摩擦，是改革过程中要克服的一种困难。三是观念同化现象。有的地方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不注意进行观念更新，出现了用旧观念“消化”新政策、新体制，把改革纳入到旧观念的框框里去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比如实行奖金制度本意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和克服平均主义，但人们在平均主义的观念下往往用外“攀比”、内“摆平”等形式来“消化”奖金制度，结果出现了用新平均主义取代旧平均主义的怪现象。这种观念同化现象，败坏了改革的声誉，妨碍了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危害颇大。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观念更新是我国全面改革中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它是我们正常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

其次，这也是由人们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过去3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认识，并在人们的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了许多观念或固定的看法。随着改革的进行和发展，其中有的已同新的实践不相适应，

## 6 观念更新论

---

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观念进行细致的清理，更新那些不适应改革的旧观念。同时，我们在3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过程中，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理论，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可以说这是认识的一个飞跃。毛泽东曾多次阐述过，人的认识，一般都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和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两个飞跃，其中第二个飞跃比第一个飞跃“意义更加伟大”。要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这第二个飞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把人们在实践中产生并经过一些人的头脑科学加工而形成的认识和理论，在实践不断检验的过程中，转化为实践主体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的观念。因此要把全面改革的理论，转化为亿万人民生气勃勃的实践，就要首先把这些理论转化为支配干部和群众各种行为的观念。从书本上的理论、文件上的决策到实践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是一个观念建设的过程。没有这种观念建设，就会成为毛泽东所描述的“古董鉴赏家”。嘴里连声称贊“好理论！好理论！”但头脑中还是一套旧观念。他们不会“有的放矢”，用这一理论去改造客观世界，首先在于他们没有用这一理论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在认识过程中，既要清理旧观念，又要建设新观念，只有这样经过观念更新，才能实现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在新旧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是这样，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过程中也是这样。正如赵紫阳同志在六届四次人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

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观念更新是时代的要求，有其客观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观念更新，适应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呢？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它需要通过观念学的研究，来进行具体的指导。观念学，应该是关于观念发生和变迁的一般规律，关于观念的结构和层次，以及关于观念的选择和更新等问题的学问。可以说，只有研究了观念学的一般理论，才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哲学中的政治观念更新问题。为了弄清观念学的这些基本问题，科学地进行观念更新，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观念的一般理论，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起点。

就让我们尝试一下吧！也许，这是一个难啃的苦果。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探讨观念更新问题的学术专著。本书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观念更新，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和研究。本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围绕观念更新的主题，展开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理论与实践的纵横分析和议论。